

Trade Conflict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S: History, Status Quo and Inspiration

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现状及启示

■ 宣晓影

半个多世纪以来，日美两国在密切的经贸往来过程中摩擦不断。然而，在此过程中，日本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国内产业和产品的转型升级，推动了海外供应链的搭建与完善，促进了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并通过内外改革极力规避贸易摩擦风险，其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时至今日，日美两国在贸易观方面的隔阂依然较大，贸易失衡的问题也是根深蒂固，特别是在美国企图重塑世界贸易格局的大旗下，日美新型贸易摩擦再次暗流涌动，其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日美贸易摩擦的演变及应对

战后，日美贸易摩擦经历了由日本自主限制出口转变为扩大美国对日出口，最终聚焦宏观问题三个阶段。

早期自主限制出口

1950年日本的廉价纺织品开始流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南部的纺织业大受冲击。为了避免美国单方面采取措施，日本勉强接受了其提出的自主限制出口的要求。由于当时恰逢日本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口商品中纺织品占比下降的时期，因此，日本政府通过收购多余纺织品等措施，既救助了国内的纺织业，也顺利推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收支顺差成为常态。在日美贸易摩擦最为激烈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尤其是在

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执政时期，美国的贸易逆差规模大幅增加，其中，对日贸易逆差占比超过一半。实际上，70年代日本已经对本国单方面持续扩大的经常收支顺差有所警觉，为此，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同时，积极放开进口。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明确了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态度，认为有必要自主采取临时限制出口的措施。

而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从10%以上降至5%左右，且增长动力由国内的设备投资转为外需。

中期扩大进口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美谈判的重点由限制日本对美出口转变为扩大美国对日出口，即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其中，对美国虽然有竞争力，但仍难以增加对日出口的四个行业（电气通信、医药品及医疗器械、电子、林产品）分别进行协商（MOSS协议），且以数量限制和关税等传统措施为主要解决途径。日本政府一方面与美国谈判，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国内政策减少贸易摩擦。1985年7月，日本制定了《改善市场准入行动计划的主要框架》，积极推动市场开放和自由化。1986年4月，日本发布了著名的《前川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扩大内需、开放市场、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建议。《前川报告》受到美方的高度评价，但在日本国内遭到以农林派议员为主的众多议员的反对。

后期聚焦宏观问题

实际上，MOSS协议也没能明显改变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的局

日美主要领域贸易摩擦的协商过程及结果

	协商过程	结果
钢铁业	美国的钢铁业趋向垄断，人力成本高企，竞争力下降。日本企业通过引入现代化设备，同欧盟一起扩大了在美国钢铁市场的份额。同时，为避免美国单方面采取进口限制措施，日本国内以日本钢铁联盟为主，研究、推进自主出口限制措施。	80年代前期，日本接受了自主出口限制方案，积极成立合资企业，在进口受限的美国市场扩大了收益。
汽车业	经过两次石油危机，日系车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快速上升。起初美国以抑制日本车进口为主，但随着日本厂商加快在美国的现地生产，贸易摩擦逐渐沉静。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表明不再要求日本延长自主限制出口的方针，但日本通产省仍旧扩大了出口限制额度，独自继续实行。80年代后期以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扩大美国车的对日出口。	在日本国内，日系车没有明显增长，占有率至今很低。
半导体	80年代中期，美国的半导体厂商同时出现亏损，加剧了贸易摩擦，引发日美半导体协商的开始。迫于美国的强烈要求，日本同意扩大市场准入，由日本政府监测半导体出口价格。日本的半导体厂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能力，积极进行设备投资，保证了在价格·品质方面的优势地位。	政府的价格监测影响了设备投资意愿，再加上90年代日本国内经济停滞，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逐渐衰落。

面。之后，双方的协商由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转向宏观的储蓄—投资问题，最终落实为如下具体政策：一是提出今后10年间进行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的数值目标；二是修改大型零售店铺法（大店法）；三是加强垄断禁止法的适用等。大店法的修订受到日本国内流通业的称赞，实现了在日本独特的纵向分割行政管理机制下很难推动的体制改革。然而，日本民间储蓄过剩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根本性改变。日美综合经济协议中，美国在难以缩小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引入数值目标（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降至GDP的2%以下等）。日本政府反对这种数值目标，明确表示希望按照WTO规则解决问题，其他国家也对美国采取单方面的措施持批评态度，但对美国要求日本削减贸易顺差、开放市场的主张表示理解。最终，日本在多数领域的市场开放。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产业竞争力下降，且日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已基本趋同，日美贸易摩擦逐渐消退。

日美贸易摩擦的现状

如今，日美间的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农业和汽车制造业等领域。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贸易通商政策有了很大调整，由此，日美的摩擦也不限于贸易收支失衡问题，更是涉及到了贸易规则的引领问题，拉开了新型博弈的大幕。

TPP中的美日之争

在美日主导的TPP的多边谈判中，美国要求日本减让关税、放宽非关税进口壁垒，进一步开放日本国内的农产品和汽车市场，增加美国粮食、牛肉等农产品和汽车的进口份额，以平衡美国对日贸易收支的逆差。两国曾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甚至不惜鼓吹“中国威胁论”，以求所谓的“合纵连横”，最终以日本承诺实施阶段性开放而达成妥协，政治色彩非常浓厚。

但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贸易通商政策有了很大的调整。在所谓公平贸易的幌子下，特朗普政府做了两个决策：一是不惜以退出TPP协议为筹码，要挟包括日本在内的TPP加盟成员无条件接受美国的要求，在市场开放上做出更大的让步；二是要求日本等相关国家和美国进行双边谈判，以求各个击破，将多边自贸谈判转化为双边自贸谈判，进而获得更大的贸易主导权。由此，2017年的亚太经贸合作中，存在着“三巨头”（美国、中国、日本）和三种方案（双边贸易、RCEP、TPP）竞相角逐的局面。然而，一边是力争通过双边谈判撬开市场以削减贸易逆差的美国，另一边是重视TPP等多边框架的日本，两者贸易观方面的隔阂较大，矛盾也是根深蒂固的。

日本主导CPTPP

2018年3月8日，日本等十一国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了CPTPP。由于美国的退出，日本在谈判中起到了关键作用。CPTPP可以说是TPP的“删节版”，TPP12国当初达成的协议内容的95%得到了保留，只是将大约20项美国曾极力坚持的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最TPP的元素”予以冻结。就规模而言，CPTPP是全球近20年来达成的最大自贸协定，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贸区，拥有四大洲11个国家，包括4个发达国家、7个不发达国家，总人口5亿，GDP超过10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规模的近13%，介于欧盟和中国之间；进出口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超过中国，与北美自贸区规模相当。而冻结美国曾极力坚持的条款客观上降低了CPTPP的准入门槛，提高了吸引力。

日本极力推动CPTPP的意图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是谋求在CPTPP的基础上实现扩员，进一步扩展国际影响力。从中长期来看，由于美国统治阶层视TPP为遏制中国崛起的主要经济支柱，未来美国卷土重来是大概率事件。特朗普更看重双边谈判，有可能把达成对美国更有利的协议作为重返TPP的前提条件。而若日本挟CPTPP自重，拉其他国家一起与美国等经济体谈判，其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日欧合作应对美国

实际上，五年前日欧就已展露“结盟”意愿，2018年7月日欧经济合作协定（EPA）的达成应该说是水到渠成。日本政府力争在今秋召开的临时国会上完成批准手续，促使EPA在2019年3月前生效，一个占全球GDP约30%的自由贸易圈即将落地。拓展双边与多边关系一直都是日本的重要战略。相比中日韩自贸协定以及我国主推的RCEP，日欧谈判的政治风险较小。日欧EPA可以说是各方按照既有战略处理贸易关系，且横向加强贸易联系的体现。

EPA创造的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预计该协定可促进日本GDP增长1%，并增加约29万个就业机会。同时，该协议将使欧盟出口商每年节约10亿欧元，并将逐步扩大欧洲国家对日本的商品和服务出口。然而，日本和欧盟同为发达经济体，但优势产业的互补性不强。日欧在地理上也并不接壤，物流成本较高。日本虽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但只是欧盟第六大贸易伙伴，排在前面的是美国、中国、瑞士、俄罗斯、土耳其，双方都以中国、美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说明日欧EPA的政治姿态大于实质内容。

日美自由贸易谈判

8月10日，日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部长级贸易磋商，双方仅达成制定共同策略促进贸易发展的共识，并同意于9月再

次举行会谈，却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成果。在此轮磋商中，两国在主要议题的谈判中均处于对立状态。一方面，在贸易规则上，美国态度强硬，要求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制定单独的关税标准和货物进口范围，希望能以此撬开日本市场，削减贸易逆差；而日方则重视CPTPP，希望美方重返TPP。另一方面，在市场开放上，美国一直要求日本扩大汽车进口和开放牛肉市场，并以将提高汽车关税来要挟日本；日本则主张美方单独提高汽车关税违反WTO准则，开放牛肉市场也会威胁日本本国产业，难以与美国弥合分歧。

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情况有所不同，但对其历史回顾与动态研究都对我国应对当下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提早做好内外协调发展的准备。回顾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日本政府很早就对本国单方面经常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有所警惕，并提早做好了相应准备。我国也应该在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扩大内需和进口，使内外协调发展。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标准化及认证体制，努力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并随着产业的成长适时开放市场，提高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程度，减少非关税壁垒。同时，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主动扩大进口等举措，加快改革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加强自主研发和产业结构升级以缓解摩擦。日本推进废除或下调关税等自由化措施，利用外来压力推动国内的改革及产业结构调整，利用贸易摩擦带来了正面效应。然而，二战后日本大量引进美国技术，将之改良后开发出更实用、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但随着日美贸易摩擦升级，很多大企业都因专利纠纷而遭到美国企业起诉也是我国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因此，必须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加强自主研发。

努力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日本企业为规避贸易冲突，加快了海外投资，构建起长期有效的全球产业链。现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日益扩大，在多边和双边框架内寻求与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实现双向投资与贸易的平衡，打造“中国品牌”，努力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我国应提升现有自贸区的标准，缩小同世界上开放水平高的自贸区的差距，营造好环境，留住自己的资本，并吸引外部资本进入。

充分利用国际舆论，集中关注主要矛盾。欧美一直在敌视东亚经济一体化立场上保持高度一致，由此导致了2012年东亚FTA胎死腹中以及中日关系的恶化。当下，美国挑起贸易战正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机遇。尽管日欧同盟有遏制中国影响力之嫌，但在此关键时刻，日欧结盟且与美国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即便影响有限，伤不到美国的根本，但敏感的美国舆论会跟踪、放大这些负面影响，动摇美国整体贸易保护主义的意志。我们应抓住历史机遇，加强中日务实合作，尤其是在经贸和科技领域，为两国扩大共同利益提供制度保障。今后，联手对抗美国的双边及多边活动将层出不穷，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舆论，集中关注主要矛盾，借力打力。

深度研究CPTPP，提前布局。当前全球多边贸易关系非常复杂，无论是签署EPA还是加速CPTPP，日本的战略意图有目共睹——建立与中国竞争的框架，取得亚太地区经贸规则与经济新秩序的主导权，以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大的战略来看，日欧结盟既能制约美国，又能抗衡中俄，同时促成印太连接，且都对我国的贸易环境提出不可忽视的挑战。从中长期来看，一旦CPTPP做大，其很可能会主导亚太地区的国际贸易规则。对我国经济来说，这才是最大的威胁。为此，我们应加大全球自贸区发展的研究力度，以及开展加入CPTPP和深化金砖国家间合作的可行性研究。对新规则细节和发展走向进行技术层面和战略层面的全面研究，了解清楚利与弊、危与机，提前做好调整和布局。

坚定推动RECP，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美贸易谈判历程来看，改变一个国家的商业习惯和宏观的储蓄-投资行为极为困难，美国贸易收支逆差本质上源于国内储蓄率过低和过度进口，其贸易收支失衡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本国产业及产品的竞争力，而不是靠贸易战。为此，我国应稳住阵脚，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同时，充分发挥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渠道的作用，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规则。我国要真正做到开放，坚持贸易公平和合作共赢的原则，求同存异，在亚太地区多边贸易格局中积极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责任编辑：韩晓宇
hxyjy2007@126.com